

语言规划经典译丛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

〔英〕苏·赖特 著

陈新仁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语言规划经典译丛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

〔英〕苏·赖特 著

陈新仁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英)
赖特著;陈新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语言规划经典译丛)
ISBN 978-7-100-08851-0

I. ①语… II. ①赖…②陈… III. ①语言政策
②语言规划 IV. ①H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8268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

[英]苏·赖特 著

陈新仁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851-0

2012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0 1/4

定价: 45.00元

顾 问

陈 骏 陈章太 戴庆厦 李 嵬 李宇明

主 编

徐大明

副主编

王铁琨 姚小平 范德博(Marinus van den Berg)

编 委(按音序)

蔡永良 陈 敏 陈新仁 丁言仁 范德博(Marinus van den Berg)
郭龙生 郭 熙 刘丹青 王海啸 王建勤 王铁琨 徐大明 姚小平
赵蓉晖 周洪波

了解世界怎样做语言规划

——序《语言规划经典译丛》

李宇明

“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是指政府、社会组织或学术部门等对语言生活(Language Situation)所做的干预、管理及相关计划,其中包含语言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等内容。研究语言规划的学科可称为语言规划学。

传统上,语言规划可分为语言地位规划(Language Status Planning)和语言本体规划(Language Corpus Planning)。地位规划确定语言(包括文字)及其变体的社会地位,内容较多涉及语言政策,比如国语的选择、民族共同语的确定等等。本体规划是在地位规划的前提下进行的,目标是促进国语、民族共同语等这些有社会地位的语言不断规范、完善,使其能够很好发挥地位规划赋予的语言职能。本体规划的内容,包括文字的创制与改革,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规范,拼音或注音方案的创制,以及各种语言技术的发展等等。今天常说的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基本内容都属于语言的本体规划。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语言规划者认识到,国家语言规划的主要任务应当是管理语言生活,而不是管理语言,虽然管理语言生活必然会涉及语言本体。语言生活在哪里?在各行各业中,在各个社会领域中,因此,管理国家语言生活,主要任务就是管理各领域的语言生活,为各领域做“语言功能规划”(Language Function Planning,见李宇明《语言功能规划刍议》,《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1期)。语言功能规划,是在语言地位规划的总体框架内,更仔细地确定各种语言文字(及语言变体)的社会功能,规划各个社会领域怎样综合发挥各种语言文字的作用,目的在于使各种语言文字各安其位,各得其用,各展其长,构建起多种语言现象互补共生、和谐相处的“多言多语”生活。

人类语言规划的活动早已开始,但是语言规划学却十分年轻。1959年,豪根(Haugen)最早提出语言规划的概念,之后涌现出一批语言规划的

经典著作,如《发展中国家的语言问题》(Fishman, Ferguson and Das Gupta 1968),《语言可以规划吗?——专为发展中国家所用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和实践》(Rubin and Jernudd 1971)、《语言规划的进展》(Fishman 1974)等。这些著作奠定了语言规划学的基础。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语言规划研究仿佛走入了低谷,但进入 21 世纪之后又重受关注。这得益于新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思潮,如新一轮的世界一体化进程,世界性的大移民,复苏的族裔—民族主义,语言危机,英语在全球的传播,一批新国家的出现等。据研究,当前国际语言规划研究表现出四大特点:

第一,研究范围急速扩展。除传统的研究内容之外,又增添了当代语言生活的许多问题,如语言认同,语言复兴,少数族裔和外国移民的语言权利,双语教育,全球化与语言多样性,语言的国际传播,语言濒危与语言保护,语言信息化等等。

第二,研究视野涉及全球。过去,语言规划主要关注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而今的研究视野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美国等移民国家、西方老牌的单一民族国家、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新国家、各种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等,它们的语言问题都引起了语言规划者的浓厚兴趣。可以说,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都纳入了语言规划的研究视野。

第三,研究观念发生转变。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语言多样性常被看作社会麻烦,看作阻碍国家建设的离心力量。那时语言政策的宗旨,就是确定单一或有限的官方语言,并尽力去完善、推广。但是,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最近十年,人们对待语言多样性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各种语言及其变体,被看作是值得珍视、应当努力保护的人类公共财富,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系列文件,欧盟的一长串官方语言名单,便是维护语言多样性这一态度的具体体现。

第四,多学科共同参与。语言生活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社会生活,也是众多学科研究的对象;语言规划绝不仅仅是规划语言,规划的是众多学科共同关心的社会语言生活。事实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民族学、传播学、信息科学等学科,都已纷纷进入语言规划领域,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语言规划正在成为政治家关心、多学科参与、影响国家与国际新秩序建构的学科。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语言规划的国家之一。先秦诸子早就从伦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人的言语行为规范。孔夫子主张“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提倡在庄重场合使用雅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

语·述而》)。战国时代的鸿儒子思,在《中庸》中已有“书同文”的记述,虽然其真其伪后世莫辨,但在秦国席卷天下、横扫六合之时,确实以政府力量推行了“书同文”政策,用小篆统一了六国文字。北魏孝文帝“断诸北语,一从正音”,进行了著名的语言改革。历史上许多朝代都颁布过字书、韵书,统一文字、音韵等标准。特别是从清末到民国,语言规划的实践进入现代阶段,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等,都汇入到救亡图存的滚滚历史洪流中。新中国实行语言平等政策,普通话推广、汉字改革、少数民族文字设计、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与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等重大语言规划,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保障语言权利、和谐语言生活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我国有悠久而广泛的语言规划实践,有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法规与言论,有专门的语言文字工作机构,但是语言规划学的发展却不怎么理想。其一,对中国语言规划的三千年历史缺乏系统梳理,对百年来的中国现代语言规划缺乏科学总结,对中国当下的语言生活缺乏全面研究,对中国语言生活的未来发展缺乏逻辑预判。其二,对世界各国语言规划的情况了解不够、研究不够,对各种国际组织的语言规划关注不够、参与不够,对国际语言规划学的成果介绍引进不够。其三,没有全面及时地向外介绍中国语言规划的情况,因而也妨碍了国际语言规划学界从中国语言规划的实践中汲取学术营养。

当前,中国语言生活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主要表现是:第一,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导的“多言多语”生活正在形成,解决语言矛盾,维护语言权利,做好语言服务,成为国家重要的语言文字工作。第二,混合型语言交际方式(人与人的交际、人与机器的交际、机器与机器的交际)已经实现,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快速发展,社会正在产生一批新的语言产业、语言职业,语言与经济的关系空前密切。第三,中国正在由“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转变,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步伐空前加大,国外语言生活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第四,公民的语言能力关乎人力资源强国的建设,已经写入国家的语言规划,并且也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衡量国家语言能力的的基本要求是,世界任何地方发生需要国家解决的事件,国家都能得到合适的语言支持;当然更为远大的目标,是在国家发展中能够充分获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方方面面的“语言红利”。

在语言生活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显然需要更为科学的语言规划;科学的语言规划显然需要语言规划学的支撑,语言生活的现实呼吁中国语言规划学的发展。《语言规划经典译丛》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语言规划经典译丛》酝酿多年,列入译丛的都是本学科的经典之作,并聘请外语水平高且谙熟专业的行家进行翻译。遴选经典的过程得到了国外专家甚至作者本人的大力支持,翻译过程又有专家团队支援,完稿之后再经专家认真审订。这种“精品意识”和严谨的操作,本身也具有“经典性”。

大约是 2004 年,一些学界同人曾经建议编辑出版三套系列丛书:《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从政府的角度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的现状;《中国语言生活蓝皮书》,从学术的角度讨论语言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并提出对策和建议;《语言生活黄皮书》,介绍国外语言生活状况,并及时引入国际语言规划的学术成果。数年过去,《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已形成 AB 两个系列,其中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从 2005 年开始逐年发布,已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中国语言生活蓝皮书》也曾数度开会,数拟提纲,但因其工作难度大,至今仍是理念之物。《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大约可以看作《语言生活黄皮书》的一部分,它的出版,把语言生活系列“皮书”的计划向前推进了一步。而这套丛书更为重要的意义,是能够促进中国语言规划学的发展,并可以为中国语言生活的规划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2011 年 4 月 5 日,清明节

致 谢

与我之前的所有学术工作一样,本书得益于过去十年中与我一起工作过的所有人,他们的想法和论点让我受益良多。我特别要感谢所有那些付出宝贵时间与我一起讨论本书观点的人,尤其是克里斯汀娜·布拉特·鲍斯顿、约翰·约瑟夫、达里奥·卡斯提格里奥恩、丹尼斯·阿格、亨利·米勒、凯特·米勒、夏洛特·霍夫曼、伊丽莎白·厄尔琳、丹尼斯·史密斯、约翰·莱克斯、大卫·布洛克、海伦·凯勒·霍尔姆斯、莱克斯密·霍兰德、米歇尔·斯特鲁贝尔、苏·瓦尔顿以及朱丽安·艾德格,他们阅读了本书各章并给予了评论。我要对阿尔斯顿语言研究系的所有同事表示谢意,他们在我休学术假期间帮助承担了所有工作,而且一直为我提供精神和思想上的支持。我也要感谢我的研究生们,他们的反馈在我的思想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让我充满感激的还有阿尔斯顿现代语言研究基金会,他们提供了研究资助,让我可以找人帮助翻译我所不熟悉的第一手语言素材。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女儿安娜,她帮助我做了本书索引,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各种准备工作。当然,本书之讹误概由本人负责。

本书献给珂林(Colin)、汤姆(Tom)和安娜(Anna)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部分 社区与国家语言的作用	
第二章 从语言连续体到语言马赛克:从封建时期到民族主义 时期的欧洲语言社区	19
第三章 国家民族和民族国家中的语言规划	41
第四章 后殖民时代的国家建构:新形势下的旧观念	68
第二部分 超越与语言学习	
第五章 超越社团:社团接触使用的语言和通用语	99
第六章 法语:一门久负盛名的通用语的兴起与衰落	116
第七章 英语:从帝国语言到全球化语言	132
第八章 后民族主义时代的语言:霸权,还是超越?	152
第三部分 小型语言社区中语言的复兴和再生	
第九章 少数民族及其语言的新话语、新法律工具和新政治语境	175
第十章 旧民族国家的解体与小国家的兴起	193
第十一章 濒危语言	211
第十二章 结论	237
注释	244
参考文献	274
索引	304
译后记	311

第一章 绪论^①

1

本书以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为研究对象,讨论的自然都是这一学科的核心问题,当然也会较多地谈论语言官方化[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的法律程序问题,探讨语言研究机构或精英模式倡导者所规划的语言变化问题[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政策的措施和管理,因为这是确保所选择和规划的语言在教学中使用[语言习得规划(acquisition planning)]所必不可少的。此外,本书还涉及许多其他话题。例如,我们会反思政治事件和社会进程,而这一点在本领域的研究中一般不是考虑的对象。笔者认为,语言政策的正式制定和规划活动虽然在人类历史上起步相对较晚,但作为一种非正式活动,其历史同语言一样悠久,而且对社会中的权力和资源分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许多政治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值得我们z从政治角度加以专门研究。

笔者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LPLP)的思考,缘起于韩礼德^②(M. A. K. Halliday)1990年在第九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上所作的一次经典报告。他指出:

语言规划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活动,涉及两个完全不同而且可能相互冲突的主题:其一是我们的语言和其他符号活动所共有的“意义”主题;其二是关于“设计”的主题。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宽泛地区分设计的语言系统和进化的语言系统,那么语言规划就意味着在一个自然发展的系统(即语言)中引入设计过程和设计特征。(Halliday 2001:177)

① 本书的全部脚注均由译者所加,书中不另外注出,特此说明。

② 韩礼德(M. A. K. Halliday),英国著名语言学家,伦敦学派的主要成员、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代表性著作有《语言功能探索》(1973)、《语言的系统和功能》(1976)、《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1978)和《功能语法导论》(1985)。1976年,韩礼德移居澳大利亚筹建悉尼大学语言学系并担任系主任,1987年12月退休。

于是,笔者想:人们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运用一定的语言形式来实现特定的交际目的呢?或许,语言在其形成过程中似乎早就如此了。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似乎有可能从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语言习得规划的
2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狭隘定义中拓展开来,将它视为可以涵盖所有人类理解与交流活动的研究领域。若从这一角度来研究这一学科,我们就会踏上前途也许无限广阔的新征程。

有人可能会认为,“自然”语言总是带有“设计”成分,毕竟语言是一种受规则约束的系统。譬如,我们如果不能在音位所承载的语义成分问题上达成一致,就无法开展交流。语言之所以能发挥交流作用,是因为同一个言语社区的所有成员都接受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这些选择具有任意性。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①之间的联系是靠规约行为(特定社区给这些语音赋予意义)和规定行为(将一个集团和另一个集团的语言区分开来以及避免集团内部的分裂)来维系的。一门语言之所以最终存在,是因为这个社区选择了它。所以,语言到底是“自然进化系统”还是“人工设计系统”,很难说得清。

从社会角度看,我们同样可以说,社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拥有语言作为存在手段。换句话说,语言是我们维系社会生活的手段,是让我们能够建立社区的主要因素。人类本质上是社会动物。语言有各种内在的优势,能让人们一起规划未来,共享、学习过去的经验,在共同参与的活动中相互合作。语言自身在社区构成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规约行为(遵循语言规则)和规定行为(施行语言规则)在社区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

笔者感兴趣的正是广义上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想研究的是人类如何习得、运用、商讨不同语言变体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巩固自己的集团,张扬自己的个性。这里,笔者想回应一下奥·里亚加因(Ó Riagáin)针对社会语言学提出的批评:

国家语言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会受到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严重约束。它们的影响深远,甚至比语言政策本身还重要得多。然而,社会语言学家却没有开展这方面的专门研究。(Ó Riagáin 1997: 170—171)

要回应这一质疑,我们有必要关注政治和社会科学领域,汲取经济学和

① 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是构成符号(sign)的两个方面。就语言符号而言,前者指的是语言形式,后者指的是语言形式表达的意思。

法学知识,在历史框架内考察影响语言选择与变化的事件和进程。这一研究路径必然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诚然,我们都知道介入自己专长之外的领域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正如奥·里亚加因所言,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这一领域里,不这么做也许更危险。

1.1 什么是语言

在讨论本书主要内容之前,我们也许首先要考虑两个人门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要回答“什么是语言”。有一个学派将语言看作是一种文化概念。爱德华·萨丕尔^①(Edward Sapir 1921:7)认为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非本能的、借助一系列自然产生的符号来表达思想、情感及需求的手段”。我们使用的词语和话语都指向共同体验,因而可以分享现实、思想和经验知识,并把它们纳入某一类世界知识中去,而每个社团成员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复制这种知识的。一个社团的语言反映该社团的社会和文化现实,而且实际上也构筑了这一现实。这就是萨丕尔和他的学生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Whorf)所作研究的核心思想,即所谓的“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

“语言决定论”的强式假设认为语言决定思想。这一说法并没有多少人青睐。外语学习、新词汇的扩展以及翻译活动都与母语决定我们的思维过程这一理论有所抵触。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的弱式说法,即认为人类很可能是按照语言带来的便捷方式去感知、加工、辨识和记忆,似乎更有说服力,因而更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

建构主义^②(constructivism)者似乎一开始就持相反的观点。他们主张,人类使用语言的方式会影响他们看待自然世界的方式,而不是自然世界影响语言。韩礼德清楚地描述了建构主义者的立场:

语言并不是消极地反映现实:语言积极地创造现实……人类物质

^① 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代表著作是《语言论》(1921)。他与他的学生兼同事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Whorf, 1897—1941)提出了著名的“语言决定论”。

^②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思想最早可追溯至瑞士的皮亚杰(J. Piaget)。该学说认为,儿童通过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发展自身的认知结构。建构主义可以很好地解释人类学习过程的认知规律,包括学习如何发生、意义如何建构、概念如何形成,等等。

生活中的范畴和概念并不是先于语言表达产生之前就“给予”我们的。相反,它们是在物质和符号互动中通过语言来理解的。因此,自然语言的语法,即句法和词汇,既是人类经验的理论,也是社会行为的准则。就语言的这两种功能(或元功能)而言,语法创造了我们扮演文化角色的潜势。这一潜势既赋予了我们能力,又制约着我们,即语法使语言表达意义成为可能,同时又对意义潜势加以限制。(Halliday 2001:179)

建构主义者界定语言时考虑到了语言的动态属性。新的事实、思想和事件需要有新的语言表征。说话者使用新的方式审视旧思想、旧事实和旧事件,需要重新调整谈论它们的方式。意义总是在不断协调中产生的。因此,我们使用的语言在单纯表述文化现实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创造现实。我们既塑造语言又受语言塑造。有趣的是,在这一定义的最后一句话里,韩礼德提示我们,建构主义者的立场实际上与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的弱式说法有某些一致的地方。

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赞同这一论点。语言共性论者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人类早期演化的产物。斯蒂芬·平克^①(Steven Pinker)在他的《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一书中持有这样的观点:人类运用语言的能力与人类直立行走的能力一样,都不是文化产物。

复杂语言具有共性。这一发现令语言学家感到惊诧。我们有理由怀疑,语言并非任何文化发明,而是人类某种特殊本能的产物。(Pinker 1994:26)

这也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观点,他在《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1871)一书中得出的结论就是:语言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近期许多研究已经开始验证这一观点。当下神经科学研究旨在证明达尔文论断的正确性,只是证据尚未齐备而已。乔姆斯基(Chomsky)在缺乏大量实验数据的情况下¹赞同这一观点并建立了相关理论,认为人类天生具有一系列非常丰富和明晰的心智属性,因而天生就会学习语言。他的生成语法理论正是缘于下面这样的认识:

^① 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1954—),美国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主要研究视觉认知和儿童语言发展。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生物本能或自然选择的结果。《语言本能》(1994)是其众多畅销书中的一本。

难以回避的结论是：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不管其功能如何，必须有某种限制性的、原初的机制预先就确定了如何依赖结构性操作。正是这一机制指导学习者如何习得语言能力。（Chomsky 1972:63）

另一观点迥异的学派认为，语言是社会和语言使用者的必然产物。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语言是建立在其服务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随着人类经济生产方式经历了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语言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乃是根基于经济生活的上层建筑的观点。语言自身不断地适应新的存在方式。这一定义忽略了语言的主体性，与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的强式立场有点类似，带有决定论色彩。

笔者个人更赞同韩礼德的观点，即语言是我们通过社会化融入社团的 5 主要手段，是我们表达意义的主要方式。这是本书立论采用的定义。我们受到所在社会中意义表达方式的影响，也受到意义扩展过程的影响。笔者也同意萨丕尔的一些更为细化的说法。外部环境对于语言的影响从来都不是直接的。自然世界由社会和文化充当中介。某一社团对外部世界的某一方面感兴趣的时候才会加以命名。当这一命名的精确度能满足这一社团需要的时候，这一命名才会获得通过（Sapir 1921）。

不管人类语言能力源自何处，是由人脑先天带来的抑或完全是后天在社会中习得的，无论确切答案是什么，都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现在的论断。语言可能部分是生物现象，而不纯粹是社会概念或文化产物。尽管如此，它确实又是社会概念和文化产物，只有理解其运作过程，我们才能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领域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1.2 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语言？

将语言归结为社会产物的实证基础之一就是世界上存在着丰富的语言资源。有人认为世界上语言多达 6809 种（Ethnologue 2000）。不仅如此，许多过去曾经存在的语言现在都不存在了。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如果语言是使人类成为社会性动物的主要方式，那么如此丰富多样的语言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想弄清楚：

智人消化器官完成了进化，并以同样复杂的方式运作，按正统的科学来说，他们的生物结构和基因潜质基本一致。他们的大脑皮层在所

有种族中和所有的社会进化阶段都如出一辙。可为什么这些个体各异,但整体相近的哺乳类动物却不使用同一种语言呢?(Steiner 1998: 52)

为什么人类使用成千上万种互不相同、彼此不通的语言呢? 毕竟,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乔治·斯坦纳(1998)提到了三点:部落社会因为语言壁垒,与其近邻隔离开来,容易发生萎缩;人们之间互不理解而产生蔑视、恐惧和憎恨;由于语言分化,非洲、印度和南美洲不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外来侵略者。还有其他弊端,诸如:(语言障碍)阻碍思想和技术的交流;因为多语言之间需要翻译而产生机会成本;歧视性社会体系容易对语言差异加以利用。据此,语言体系的“破坏性浪费”“非理性多样化”和“疯狂混杂”催生了“沉默地带”(zones of silence)^①和“社会分配的剃刀效应”(razor edges of division)^②(Steiner 1998:56—58)。

居住在相似气候和地理环境中,有着相同的社会组织结构、血缘关系和共同信仰的同一种族却讲完全不同的语言。对于这一事实,我们该如何解释呢? 斯坦纳说,他之所以反复地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没有哪位语言学家认为这一问题值得探讨或评论。彼得·米尔豪斯勒(Peter Mühlhäusler)倒是一位试图找出答案的学者。米尔豪斯勒认为,语言不同使得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也不相同,并反映了“几千年以来人们对复杂环境而做出的适应”。(Mühlhäusler 1996:270) 根据这一解释,每种语言内部的世界观来源于平常的积累,彼此是互补的。每种语言都可理解为对世界的一种临时性解读,“因为世界如此复杂,唯一的希望就是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去诠释它”。这一论点虽然很有吸引力,但是论据不够充分。米尔豪斯勒和其他学者提供的关于世界观差异的例子并不极端,通常都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关于颜色的感知差异,对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尊称的表达差异,对数量和整体的表达差异,等等。

另一个针对斯坦纳问题的回应源于莱科克(D. C. Laycock)的研究。莱科克认为,语言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人们有意为之的结果,因为独特的、唯一的语言是他们身份的标志。他利用从美拉尼西亚^③(Melanesia)收集来的证据表明了不同社团内部人们是如何使用不同的语言来区分彼此的。语言

① 指因文化语言差异而形成的弱势社团。

② 喻指因差异很大以至于社会财富、语言权分配泾渭分明。

③ 美拉尼西亚(Melanesia)是一个群岛的名字,意为“黑人群岛”。该群岛位于西南太平洋上,西北、东南延伸长达4500余公里。